

局中·山中·室中——陳曾壽偽滿初期舊體詩歌中的國事書寫與自我安頓*

尹諾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提 要

考察陳曾壽在偽滿時的日記、詩作及與京津地區遜清故老的唱和，可發現偽滿初期的惡劣環境曾刺激了他與部分同人的寫作，使舊詩的意義在他們手中不減反增，具有見證國事機密與安頓個人生命的雙重價值。「局中人」的位置本使陳曾壽頗感憂愁，但透過韓偓、陳與義等典範，它在舊詩中被轉化為一種記述偽滿情形的寶貴視角，詩歌也得以成為對抗現實的行動。但偽滿的濁惡與孤獨仍是其痛苦之源，陳氏開始自覺借詩歌「製造」幽居，將其「山中僻處」的孤立之境轉化為「山中樂事」的隱逸之境；而回津期間的阿育王寺唱和，則藉助了舊詩特有的唱和形式，體現和鞏固了曾壽同人間的响濡之誼與遁世理想。「紀恩室」題詠更進一步展示了遺民們以詩歌安頓生命的深度：本為紀念溥儀之優遇而有的「紀恩室」，其意義卻在同人題詠中逐漸由「紀恩」轉向「紀忠」，成為一座肯定遺

* 拙文初稿寫成於2024年12月，過程中頻蒙業師林立教授指點，又在與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吳駿逸兄切磋交流的過程中獲益良多，實令我無任感荷。修訂稿更復沃蒙《淡江中文學報》兩位老師不吝指正，茲並申謝悃！

民品格的精神豐碑。

關鍵詞：陳曾壽 清遺民 偽滿洲國 舊體詩歌

局中 · 山中 · 室中 —— 陳曾壽偽滿初期舊體詩歌中的國事書寫與自我安頓

尹諾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溥儀（1906-1967）身邊的遺民雖均渴望復辟，但他們在成立偽滿洲國一事上卻存有歧見，部分人認為關東軍並不可靠。在溥儀離津前召開的「御前會議」上，與會五人中僅有鄭孝胥（1860-1938）是堅定的出關派。「帝傅」陳寶琛（1848-1935）堅決反對，胡嗣瑗（1869-1949）和袁大化（1851-1935）傾向於支持老帝師，鐵良（1863-1938）則一言不發。^❶多種回憶錄也顯示，最初的偽滿之行實由關東軍的策劃掩護、鄭孝胥父子的秘密挾持與溥儀的配合促成，而非基於遺民群體的共同決策。^❷儘管鄭孝胥、羅振玉（1866-1940）等出關派也曾因國體不當的問題而感到懊惱，但他們大都認為可以暫且隱忍，將以有為。而反對派遺民，則會更強調置身偽滿本就是一將錯就錯之不得已局面，^❸其危險性要

❶ 關於這場會議的詳情，可參考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9年），頁280-281。

❷ 除可參考溥儀《我的前半生》中的「白河偷渡」一節外，周君適《偽滿宮廷雜憶》中的「溥儀溜到旅順」一章也曾紀其始末。參考周君適：《偽滿宮廷雜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67-70。

❸ 陳曾壽：「如國體不當，仍當辭退，亦無可如何之應付耳。自離天津一著之錯，乃有此果。」語見（清）陳曾矩、陳曾壽：《局外局中人記》，收於（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

遠大於其政治可能性。陳曾壽（1878-1949），即這樣一位代表性人物。

陳曾壽，字仁先，號蒼虬閣，湖北蘄水人。他在鼎革前官至廣東道監察御史，後曾參與丁巳復辟並被授予學部侍郎。張勳失敗後，他開始了在西湖邊上奉母幽居的生活，但期間仍懷清祚未盡之想。1930年時，他又在陳寶琛的推薦下擔任婉容的老師，遂應召舉家遷居天津。作為一位典型的清遺民，陳曾壽亦頗思復辟，但他與陳寶琛一樣反對溥儀出關。雖未參與前述的「御前會議」，但早在溥儀尚處靜園時他便曾上折反對，指出「萬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計，將若之何？是則斷不可冒萬險以供其軍人政策之嘗試」，^④此折還被溥儀視為「代表了陳寶琛這派人當時思想的一個典型文獻」。^⑤

但陳曾壽雖是一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卻又身負種種特殊性。第一，與陳寶琛托詞高齡留在天津不同，陳曾壽日後仍隨扈偽滿，得以近距離地見證其中人事。但這主要是出於溥儀以「患難君臣猶兄弟也」^⑥的溫語相感，陳氏在偽滿中始終未任一切實職。第二，陳曾壽舊詩造詣可觀，乃汪辟疆詩壇點將錄中的馬軍八驃騎之首，^⑦是偽滿國中詩名僅次於鄭孝胥者。鄭、陳二人在偽滿中也例皆有詩，但陳氏尤多，後世之評價亦見更勝。^⑧透過上述幾點，蒼虬閣詩便為後世自反對派遺民的視角出發來觀照偽滿人事，打開了一個重要窗口。

而《陳曾壽日記》整理本在近年的出版，又為從「情境文學史」^⑨的角度更

壽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頁716-753。

④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70。

⑤ 同前註，頁270。

⑥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181。

⑦ 參考汪辟疆著，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45。

⑧ 張之淦：「海藏此際所為詩，大遜中歲以前作；蒼虬則有老而愈工者。王乃微惜蒼虬晚歲詩之枯，枯字當就心境、神理、氣象求之。海藏益枯矣。」參考「《蒼虬閣詩集》張之淦批語」，收於（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436-448。

⑨ 張劍：「情境文學史與約定文學史的穩定性相對，它追求動態和多維，力求貼近文學發生發展的具體時空和場景，最大程度地展現文學史主客觀兩方面的發生發展全景，包括作家的心理

進一步地認識陳曾壽及其同人此際的詩歌活動提供了可能。日記中不僅寫有大量前所未見的詩人心事和詩歌本事，所載的交遊細節也為集中豐富的唱酬之作提供了相對完整的語境，勾畫出一幅屬於遺民故老的創作群像。惜乎這一重要資料在此前為學界多所不知，未遑利用。^⑩而基於徐雁平提出的“文獻集群”現象^⑪，近代舊詩的意義有時需要在與像日記這類文獻的關聯性研究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闡發。故學界尚少注意到的是，身入偽滿這樣的「逆緣」也刺激了陳曾壽與部分遺民故老的「逆筆」，新的詩歌動態在他們的孤吟和群詠間頻頻出現。這樣的動態實質上在民國以來的遺民詩脈絡上又刻出了一個小坐標，雖不顯眼卻仍深具意義。一方面，它有助於我們在偽滿舊體詩研究的視域中重新思考「誰是代表」的問題，^⑫深入挖掘政治分化後遺民群體多元的心境與抒情聲音；另一方面，我們亦可藉此再次強調民國以來逐漸邊緣化了的舊體詩歌的意義，因為哪怕是在光宣老輩凋零大半的偽滿時期，它也仍在不少遺民手中發揮著「安身立命」^⑬式的作

靈史和生活史，作品的發生史、發展史和生態史等。」參考張劍：〈稿本日誌與情境文學史建構——以中國近現代稿本日誌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3期（2023年），頁71-72。按此文亦據陳曾壽稿本日誌對其部分詩作與相關文學史判斷重作評估，惜較少涉及偽滿部分。

- ^⑩ 如代表性的陳曾壽研究成果《陳曾壽詩歌研究》，因寫就時《日記》尚未面世，故作者曾慶雨在探討陳氏的偽滿相關詩歌時，便留下許多空白和缺憾。參考曾慶雨：《陳曾壽詩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10月）。
- ^⑪ 參考徐雁平：〈「文獻集群」與近代文學研究的新拓展〉，《文學遺產》第3期（2022年），頁173-177。
- ^⑫ 劉曉麗在區分偽滿中的幾類作家群落時，曾提及「帝制大臣」一類。但她認為「而帝制大臣作家，是以鄭孝胥、羅振玉、臧式毅等為主的滿清遺老們，他們的作品主要是古體詩詞，多為文人之間的唱和之作。」參考劉曉麗：〈殖民統治與國民意識的建構——對偽滿洲國的文學活動的一種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2期（2010年），頁111。按，羅振玉、臧式毅均不以詩名世，鄭孝胥在偽滿中作的詩相對偏少，他本人也與多數遺民疏遠甚至決裂，唱和甚寡。其詩從內容、數量和酬唱情形上看，其實都難以反映此際「帝制大臣」的整體創作風貌。
- ^⑬ 吳盛青：「民初以降古典詩詞寫作的生生不息，顯然拋出更為嚴肅的議題。詩人以詩為志，甚至安身立命於其中，暗示了古典詩詞的文學儲備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文人養成，形塑了其自我圓融飽滿的美感經驗的表徵陌生。」已有學者揭櫫詩歌在近代詩人手中「安身立命」的重

用。作為一種「隱微書寫」，舊詩見證和保存了許多發生在偽滿高層間的國事機密；同時，它也在不斷為作為「見證者」的詩人自身，提供生活下去的力量。

陳氏在關外度過了將近十年的歲月，初入偽滿時的強烈不適應感尤其激發了他的靈感，令其創作數量大增，詩歌旨趣也豐富多元。這與他在偽滿中後期詩筆漸造枯淡、意氣稍趨平穩略有不同。本文擬由「局」、「山」、「室」這三個對陳曾壽頗具意義的空間概念入手，結合其面世未久的日記及相關資料，分析陳氏及其同人在偽滿初期的詩歌新動態及可能意義，並非是要忽視其偽滿生涯的總體詩歌動態。而是欲擇其有代表性者加以聚焦，從而深化論述、由小見大，以期為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拓展略獻拋磚引玉之力。

二、在局中：偽滿語境下的國事書寫

陳曾壽的胞弟陳曾矩（1884-1943），嘗合兄弟二人關於偽滿之日記為一稿，命名為《局外局中人記》。開篇云：「強志（陳曾矩）局外人也，而不啻局中人；蒼虬（陳曾壽）局中人也，而不啻局外人。」「局中」和「局外」，成為兩人此際自我定位的關鍵詞。陳曾矩不在偽滿任職，故為局外人；但他因大兄的緣故對其中情形又頗了解，則近乎一局中人。陳曾壽始終是溥儀近臣，又深諳偽滿人事，故為局中人；但他沒有實權，溥儀亦不能全用其言，¹⁴ 故其靡所措手政務之狀¹⁵ 又似一局外人。在陳氏兄弟的語境中，「局」其實便指涉一種權力場，

要作用，惜尚少從該角度切入偽滿舊體詩研究，回應前人之學術洞見者。參見吳盛青、高嘉謙：《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3。

¹⁴ 郭則沄：「是春，蒼虬以憂憤成疾，養局沽上，山人朝夕過從，頗策挽補，虬翁避之，惜當局不能用其言。」可參考（清）郭則沄著，馬忠文、張求會整理：《郭則沄自訂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頁74。

¹⁵ 陳祖壬所撰《蕪水陳公墓誌銘》曰：「將謂無位，股肱左右。將謂得君，靡所措手。」生動地詮釋了陳曾壽這種「局外局中人」的處境。收於（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349-350。

任何了解其機密者都能被稱為「局中人」，但又因無法真正干涉其運作而只能算為「局外人」。最後，兩人便只能擁有「局外局中人」這一尷尬而不穩定的身份，它不無諷刺地顯示著「真理」和「權力」間的張力，「認知」與「干預」間的溝壑。「非關袖手愁能輟，詣有同舟志轉歧。」（〈送大兄東行〉）¹⁶ 陳曾矩送兄前往長春的這聯詩，生動表現出作為「局外局中人」的煎熬處境——並非是處於一袖手旁觀的超然位置，內心的憂愁就能輕易斷絕。

但與曾矩不同的是，曾壽有過成為真正的局中人的機會。溥儀在長春登極後曾特任其為執政府秘書，但他堅辭不就，甚至在幾天後便獨自離長回津。理由如下：

今樞要之地，已成太阿倒持之局，為所欲為。今之言曰：「地方如有不服，則出兵征之。」臣聞之，為心驚膽戰。不待實有此事，即此一言，已足失天下之人心而有餘矣。臣不忍與此輩共立於庭，求加恩開去秘書之職。¹⁷

「人心」是曾壽政治理念中的關鍵部分。他認為「立國之要，惟以得人心為主」，¹⁸ 這與其師張之洞（1837-1909）絕筆詩中「誠感人心心乃歸」的理念可謂一脈相承¹⁹。一言可以喪邦，偽滿中人既出此失盡人心語，自然不可相與。值得注意的是，「局」的概念此處再度出現，只不過这回被曾壽賦予了極強烈的負面意味。「太阿倒持」之局，謂授人劍柄，這是賓主倒置的傀儡形勢。諷刺的背後，是他對偽滿建國之可疑用心的洞察和憤怒。在陳氏日後的詩中，還曾有「二

¹⁶ 此詩見（清）陳曾矩《局外局中人記》中，收於（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744。

¹⁷ 同前註，頁738。

¹⁸ 同前註，頁738。

¹⁹ 張之洞絕筆詩的內容以及作為語境的其與醇親王載灃間的齟齬，均可參考陳曾壽《讀廣雅堂詩隨筆》，收於（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330-344。

月臨長春，國號易曼殊。百官內外雜，非族據要樞。」（〈戊子除夕感述〉）²⁰幾句，正是謂登極大典中的國務院官員竟以「非族」的關東軍為主，也即引文中所謂不忍共立於庭者。此時，「局」的另一義項也就隱然浮出水面——圈套，²¹這似乎才是曾壽心目中的偽滿真相。因此拒絕成爲局中人，實際上是潔身自愛，拒絕成爲「地方如有不服，則出兵征之」的政治虎俵。

但在溥儀的挽留和「敢向天恩論去就」（〈溫語一首〉）²²的誠惶誠恐裡，陳曾壽還是保留了爲皇后婉容講書的工作，回長春作了一無實職的局中人。限制曾壽者，固是權力的有無、政治理念的用舍；但真正牽絆其者，還是家國之義與君主之恩的拉扯。然留在偽滿局中，耳聞目擊又盡是傷心之事：「今者建國雖名獨立，其實事事受人牽制。」²³「以日兵殺吾民，何生可樂？」²⁴「又聞處置逆產已定，此真所謂一言喪邦者也。」²⁵溥儀近臣的位置似乎只是加劇其憂愁而已。曾壽也因此生出了於事無補的無能感與罪疚感：「上以壽不肯居名，義不相強，乃每月自出帑金五百以養之。恩重無可爲報，滋益罪過耳。」²⁶國事的濁惡，經由一種「主辱臣憂」的儒家倫理，最終被內化成了對自身的批判。或是緣此，曾壽在〈題李木公肥遯廬圖〉一詩中對李國松（1878-1949）的隱居之姿表達了欽羨：「坐視良不忍，輕去慚大義。茫茫天壤寬，我行獨無地。却瞻先機者，冥鴻恣高寄。遯遠而處裕，學易符深契。」²⁷就現實處境而言，他感到「在局中」誠然不如「在局外」來的自由安適。

然而，當「局」的概念與詩歌發生聯繫時，曾壽的態度卻有了不同。「局外

²⁰ 同前註，頁 279。

²¹ 對偽滿可能具有的圈套性質，溥儀和陳曾壽都有自覺。溥儀曾在與鄭孝胥談偽滿的國體問題時說：「若落一圈套而不能自拔，真萬劫不復矣。」又說：「陳曾壽與我意見一樣。」均可參考（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 733。

²² 同前註，頁 735。

²³ 同前註，頁 739。

²⁴ 同前註，頁 127。

²⁵ 同前註，頁 147。

²⁶ 同前註，頁 154。

²⁷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 170。

人」和「局中人」的價值次序發生倒置，後者佔據了上風。試看其壬申年三月十八日（1932年4月23日）日記中語：

連日讀簡齋詩，稍有入處，其詩已成道者，脫盡凡骨，無一語不具神通，可為入黃之鑰，但其成就不如杜、黃之大，亦坐此耳。其胸襟好，詩外有事在，故超乎諸家之上。詩與國事相連者，以冬郎為最，次則簡齋也。少陵、義山乃是局外人語。²⁶

曾壽作為同光後進，取徑出入唐宋之間，對諸名家皆有心得。但像此處以國事相關詩為著眼點，推崇韓偓、陳與義而稍抑杜甫、李商隱，卻是他處未載的議論，惟見其日記之中。梳理後，可發現他雖認為陳與義的總體成就不如黃庭堅與杜甫，但於反映國事的詩上卻是歷來之僅次韓偓者。而杜甫、李商隱雖也有類似詩作，卻只是局外人語——言下之意，不免稍遜一籌。此論雖未語及「局中人」，但韓、陳的詩作為「局中人語」之勝於「局外人語」的意思已很顯然。結合四位詩人的生平來看，韓偓是唐昭宗坎壞之際最倚重的近臣，陳與義也在追隨宋高宗南渡後逐漸躋身權力中心；但杜甫、李商隱則因各自的遭際而長期徘徊在政治邊緣。由此推求，可知所謂的「其胸襟好，詩外有事」，其實意指作為權力高層的「局中人」，韓、陳二人能對其中之得失成敗有更具體的認識，並以忠愛正直之情將其反映到詩裡。而所謂「局外人語」則相反，乃因遠離政局而在議論國事時不免空泛。故杜詩作為「詩史」，其筆下的生民離亂與忠君之意並非真的被陳氏無視，只是不能算「局中人語」。

透過此篇日記，可發現曾壽已找到了兩位國事書寫的典範。而在同年四月十六日（1932年5月21日）為另一位遺民郭則沄（1882-1946）所作的〈嘯麓詩序〉中，陳曾壽再次透露出了他的相關想法，且更為詳細：

²⁶（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28-129。

……及乎宗國，則纏綿芳悱，預決其成敗得失，而不空為大言，即有所疾刺，亦原於悲憤之不容已，而無所恩怨。因其所發，知其所蘊；跡其所憾，知其所安。蓋使君幽憂憔悴，若捨詩無以自見者，皆性情之深，有以累之也。²⁹

對郭則沄之國事詩的點評，是序文中著墨最多者，曾壽就之舉出了三個優點。首先是「纏綿芳悱」，即以〈離騷〉中的屈原戀主之情比附郭則沄詩中對家國的忠愛之意。第二，是能在詩中預先判斷政事的得失成敗，而不寫膚廓的大話。第三則是保持溫柔敦厚，哪怕是在悲憤中有所諷刺，亦是出於不得已而無所私怨。有趣的是，此處的第一和第三個特征皆可與日記中的「其胸襟好」參看，都代表著某種詩人的情感和品格。而第二個特征則可與「詩外有事」合觀，因為所謂「空為大言」即難以具體之意，它正是「局外人」視角受限的難免結果，卻可為「局中人」所避免；「預決其成敗得失」，更非局外人所能為，而須參以局中之視角。

儘管此文是為郭則沄而作，但結合陳曾壽「局外局中人」的批評來看，他似乎也在藉此申明自己的作詩理念。或至少可以說：郭則沄的國事詩，正符合他在日記中對「局中人」詩的期待。郭則沄是曾壽在偽滿時期過從甚密的遺民同人之一，二人酬唱頗夥，其身世、創作情形與對偽滿的態度都值得一提。郭則沄曾在鼎革前任軍機章京，除對時局多所耳聞目睹外，也得以熟悉有清一代之史事典章。國變之後，他即以史書體例作《十朝詩乘》，雖是詩話，卻意在以詩修史，綜述有清之百年流變³⁰。這樣身兼文學與史學之才的背景也影響了其創作，在糅合了對國事的書寫與自身的哀樂後，其詩便成了清遺民「個體詩史」的一個

²⁹ 同前註，頁 135。按，陳曾壽的日記中有兩版〈嘯麓詩序〉，正文中採用更動後的第二版，也即郭則沄《龍顧山房詩集續集》所採用的刊行版。在第一版中，「及乎宗國」原為「間及國事」。

³⁰ 此處對郭則沄及其《十朝詩乘》的簡介，可參考李宇潔：《郭則沄詩歌研究》（江西：華東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23 年），頁 93-94。

樣本，³¹而這也成了曾壽得以從國事角度出發，來評價其詩歌並作發揮的基礎。另一方面，住在天津翎樓的郭則沄即曾壽日記中提到「再，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³²的舊臣之一。對於偽滿的國體問題，他在《自訂年譜》中極哀怨地寫道：

時汪袁甫歸自東瀛，居都下，感憤時事，頗有故國之思。山人屢過深談，至是複相與歎歎累歎。袁甫曰：「異時有編綱目者，必大書曰『帝為滿洲國執政，清亡。』是大清不亡於辛亥，而亡於今日也。」山人不敢置一詞，然自是寸懷灰槁，有閉戶著書之志矣。³³

有此語境，則郭之屬陳作序、陳之為郭作序，或有面向眼前時局的更深含義。所謂「皆性情之深，有以累之也」，雖是就郭則沄早先的經歷而言，又何嘗不是曾壽入局偽滿的夫子自道。序末云：「謬以予為知君深者，屬為定之，因逆君之志而感其遇如此。」³⁴既是有著相似經驗、性情、認同的知己關係，則明裡評點郭氏詩歌，暗中發揮自己近來親歷偽滿「國事」的感受，似亦未嘗不可。故儘管本人並未說破，但曾壽的處境及其基於局中人視角而形成的國事書寫標準，當是一具有因果關係的詩學動態。而在幾年後其弟曾矩所撰的〈蒼虬閣詩集跋〉中，其詩也被明確看作一更甚於韓偓、陳與義的「局中人語」：

古之遭亂世而工於言者，無過於少陵，然少陵猶處於局外，惟韓冬郎、陳簡齋身在局中，故其形於詩者，尤為痛深而志隱。兄所處，視韓、陳際遇尤過之，而其所經之艱厄，亦非古人所有者。苟以是讀兄之詩，則其所繫

³¹ 同前註，頁 98。

³²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 740。

³³ (清)郭則沄著，馬忠文、張求會整理：《郭則沄自訂年譜》，頁 73。

³⁴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 135。

於世，亦已重矣。³⁵

「在局中」的現實處境令人憂愁，「局中人語」的詩歌特點卻有值得肯定處。比較曾壽對兩者的不同態度，詩歌在危難之際的意義便呈現了出來：透過對韓偓、陳與義這兩位典範的發現與仿效，「在局中」的痛苦處境也可以被詩歌轉化為一種針砭時弊的寶貴視角，它能助陳曾壽寫出詩中有情而詩外有事的「局中人語」，並為後世存留詩史。而以此視角回顧陳曾壽入偽滿以來的國事書寫，或能挖掘出更深的用心和更多的意義。試看其偽滿建國前夕所作的〈假翮〉一首：

強鄰假翮盛文公，何恤胼勞與后中。志決艱辛原不悔，居深情偽故難窮。貪天功有之推耻，投璧心能咎犯同。自古君難臣不易，漫夸返國倚西戎。³⁶

張之淦手批該詩云：「蒼虬入滿洲後，詩遂多此題目，蓋志苦心蹇，且又不能訟言，更又不能已於言，無奈何，乃作此等言語也。」³⁷要言之，此詩成了蒼虬的「訟言」，使其不能已的悲憤得到抒發。然而，該詩其實也指涉了許多隱秘的人事，又含有對偽滿得失成敗的判斷，兼具保存史料和批判國事的理性向度。「強鄰假翮盛文公」，謂鄭孝胥等人欲借日人之手復辟，一如當年的晉文公重耳借「強鄰」秦人之手復國。「何恤胼勞與後中」，則指晉文公在返國以前曾令手足胼胝的勞苦功臣走在隊伍後面，這正與溥儀先一步離津而拋下陳曾壽、胡嗣瑗等近臣的局面相似。「志決艱辛原不悔」，指其日記中所謂的「壽言只要心定，無論如何危險，皆不足以動之」，³⁸但「情偽難窮」的局面也意味著不該輕舉妄

³⁵ (清)陳曾矩：《蒼虬閣詩集跋》，收於(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394-395。

³⁶ 同前註，頁171。

³⁷ 同前註：《蒼虬閣詩集》，頁443。

³⁸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720。

動。而鄭孝胥父子等人，卻為圖謀介子推昔日所恥的擁戴之利而挾持溥儀離津，溥儀竟也如晉文公投璧於河誓與咎犯等人同心般一起入了關東軍圈套。為此，曾壽化用《論語》中「為君難，為臣不易」³⁹一語來抒發自己的愁苦，並悲觀地認為鄭孝胥對的自誇只是「漫誇」，暗示事不能成。

出於復辟的訴求，借秦力成功復國的晉文公重耳一直被遺民拿來當作榜樣。但曾壽此詩處處反用重耳故事，其實蘊含了其政治遠見：「昔晉文公藉秦力以反國，必有欒、郤、狐先為之內主。……自古未有專恃外力，而可以立國者。」⁴⁰特定歷史事件之成功有其特定條件，不可囫圇比附；復辟大計需要援助，但不能專恃外力。此詩隸事恰切，句句有本，也預先表明了對偽滿的悲觀態度。儘管有所諷刺，卻又無惡語相向的私仇之意。由此來看，似已具有前述「局中人」詩的特質。此外，又如〈四月五日作〉一詩：

忍教水火答壺漿，豐鎬遺恩苦未忘。取媚歌觴寧免死，全犧孤注欲何償。早知帶汁充諸葛，復見靴刀警壽皇。請劍不成空寂寂，老謀壯事兩茫茫。⁴¹

首句反用《孟子》「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⁴²句意，謂不忍見東三省百姓對溥儀君臣的歡迎，竟被答以日本士兵的暴行；⁴³次句謂無法忘記清廷舊恩置身事外，此種心情頗苦。其中，「苦」字突破了類型化的遺民情感，將普遍良知與宗國深情在其內心的矛盾呈現了出來，有血有肉，已具

³⁹ (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37。

⁴⁰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71。

⁴¹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322。

⁴² (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207。

⁴³ 按，曾壽曾在日記中痛斥鄭孝胥給陳寶琛書信中的「要使人民有樂生厭惡之望」一語，又另有批語曰：「三省人民皆云不是我皇上來，恐是日皇之兄弟來假冒者，不然何以派日本來殺民耶？」可與此句參看。可參考(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27。

備成一「個體詩史」的關鍵要素。⁴⁴ 頷聯兩句，一曰諂媚日本人終無好下場，一曰以家國作賭注的代價難以承受，皆是預決成敗得失之言。而「帶汁諸葛」則用郭倪落淚事，諷刺鄭孝胥在離津前自信滿滿卻在入長後因日人的模糊態度而懊惱不已，被曾壽在日記中批評為「其前之邁往可笑，後之沮喪亦可笑也」。⁴⁵ 「靴刀」用宋高宗靴裡藏刀以防備秦檜事，隱射溥儀對「帝室御用掛」吉安剛直的不信任：「不過由於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我才敢吃。」⁴⁶——此二句真乃機密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出。

此類詩在其集中還有不少，時間跨度亦覆蓋了曾壽的整個偽滿生涯。除上引兩詩外，從「一名所繫重山嶽」（〈除夕同君適至旅順行在所燈下檢上海友人所贈詩詞感賦〉）⁴⁷ 的爭尊號，到「文叔鷹鷂起帷帟，勤求故劍良難哉」（〈邯鄲道〉）⁴⁸ 的諷溥儀廢后，最後到辭世前一年以「滔天非一族，神州竟淪胥」（〈戊子除夕感述〉）⁴⁹ 的批判性長詩回顧偽滿的始末，他實際上完成了一屬於反對派清遺民的個體詩史，並兼以「局中人」的難得視角。結合其日記、詩序及在詩中呈現出的良苦用心，可以發現曾壽其實是在自覺地仿效韓偓、陳與義等典範來創作「局中人語」，其中有詩人的主體性可言，而非單純就擒於「志苦心蹇」的無奈何。這便近於嚴志雄所謂的「詩歌見證的驅策」：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詩人們將思想、感受、情緒強烈的顫動轉化為一種「詩歌見證的驅策」（an imperative of poetic witnessing）。……此一焦慮驅策著詩人在一首又一首的詩篇中銘刻下他們的（以及這個世界的）體會

⁴⁴ 朱剛所提出的「個體詩史」的概念，指詩歌中所蘊含的不是「無歷史」的類型化情感，而是「有歷史」的具體化的、個人化的情感，可藉以理解曾壽國事書寫中的微妙情緒。可參考朱剛：《蘇軾十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頁426。

⁴⁵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721。

⁴⁶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362。

⁴⁷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173。

⁴⁸ 同前註，頁195。

⁴⁹ 同前註，頁279。

與經歷，以此重新肯定自己存在、仍活著的意義，並為後世留下歷史見證。⁵⁰

曾壽的自我認同與詩人身份高度綁定，故雖然身處偽滿局中，若能寫出足以踵武前人的「局中人」詩，未嘗不是一種不幸裡的萬幸。由此，詩歌的存在轉化了陳曾壽作為「局中人」純然痛苦的處境，為其精神世界帶去了一些安慰。但透過嚴志雄提出的「詩歌見證」之概念，我們可以看到「局中人」的位置也反過來將其詩歌轉化為一種有力的行動：它見證、批判、抒發，最終匯合為詩人對現實在最小單位上的抵抗。儘管在政治漩渦中，詩歌可謂最微末的行動，但只要是行動，便多少會給予行動者以對自我力量的體認——這或許正是時有無力之感的曾壽所最缺之物。在詩歌中，詩人找回他的權力。

然而，文字及其背後的思考有時也劍帶雙刃。「在局中」久矣，陳曾壽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一些調整。

三、在山中：「製造」幽居與阿育王寺唱和

「相思徒抱千迴意，契闊曾無一紙書。深語恐妨憂國病，漫言還苦致情疏。」（〈雪夜寄潛樓〉）⁵¹ 在偽滿之初的這首寄詩中，曾壽展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若寄信只是尋常問候，則不能致其情意；但若嚴肅論及國事，又會引動自己的憂國之病。如此進退兩難，正是其向另一遺老劉廷琛（1867-1932）「曾無一紙書」的原因。曾壽意識到，他的憂國已成病症。

如前所述，曾壽曾在〈嘯麓詩序〉中提過一種「悲憤不容已」的心態，正是它為國事書寫帶去了諷刺的向度。但不難推想，這也是「憂國病」的表現之一。曾壽的另一位遺民好友周達（1879-1948）似已感受到此病在他身上的外化：

⁵⁰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及其歷史脈絡》（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21年），頁59。

⁵¹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171。

「京塵在袂霜在顛，顰面似帶憂國顏。」（〈蒼虬南來弔漚尹侍郎之喪談北事甚憤作長句贈之以送別〉）⁵² 在見證國事的過程中，如何應對相伴的心理創傷成了一新問題。然而此病原不在肉身之間，如何抓藥？詩，再次成了曾壽為自己找的一味方子。試看其壬申年六月廿五日（1932年7月28日）日記：

夜醒，百端交集，乃作〈幽居〉一首，以移此心。

運水搬柴自給供，山中樂事少人逢。偶先睡起鳥聲靜，獨見開時花意濃。雲氣難消當戶障，龍姿最愛倚廊松。年來真識幽居味，洗盡凡心夜半鐘。⁵³

這段文字至少有兩處值得留意。首先是詩歌功能的轉向。在曾壽手中，它由上一章面向國事機密的「見證」，轉向了此處面向自我生命的「安頓」，「以移此心」即改善心境之意。曾壽夜醒後「百端交集」，中必有與前述「憂國病」相關者，但此時他卻選擇以作詩來消憂，而不同於日常生活中的圍棋、麻將、與人夜談等方式。這便體現了詩歌在發揮其功能時的「優勢」：它不需要與人作對結伴，也可以不顧時間地點，當你需要它時，它就在近處。其次，曾壽以詩消憂的形式亦十分特別。該詩旨趣只在「幽居之樂」四字，但這恰與曾壽的實際感受矛盾：若真是如此，則何來「百端交集」，又何須「移」之？不難發現，曾壽是試圖用詩來塑造一理想的「山中樂事」之境，並藉此變換心境；故詩中有多樂，實際就有多苦。因此，該詩的消憂方式不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⁵⁴的宣洩痛苦，遵循從心到詩的自然路徑；而更近於「風以動之，教以化之」⁵⁵的化育調整，構成從詩到心的反向作用。他實質上是在借詩歌把幽居的理想呈現在文字中，從而

⁵² 詩見胡迎建主編：《同光體詩派著作集成（50）》（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頁209。

⁵³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56。

⁵⁴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0。

⁵⁵ 同前註，頁30。

爲自己「製造」幽居，深具主觀性和主體性。

值得注意的是，〈幽居〉被誤收入《蒼虬閣詩集》的卷四之中，而該卷係年的民國十一年左右，曾壽尙在西湖邊奉母隱居。當時的生活與該詩情境相近，若非日記點明，或許不易察覺有誤。一詩如此，便可能有百詩如此；這也提醒我們，對於缺乏箋註的近世詩歌而言，其內容與創作背景間的關係、「約定文學史」與「真實文學史」間的距離，大有可從「情境文學史」⁵⁶的角度深加反思的餘地。而若進一步考慮曾壽的「情境」，也會發現他將偽滿視爲「山中」並非空想，可能有更深的語境。在幾日前寄袁思亮（1879-1939）的信中，他曾說：「壽在此非有甚要之事，未嘗入見，亦不見客。終日惟以讀書習字自課，無異山中僻處也。」⁵⁷此處的「山中僻處」，便指其基於政治立場而自願保持的清閒孤寂的生活狀態，並非真居於深山老林。從這一角度理解〈幽居〉的「山中」，是否更爲恰當？不過，此信中尙無「樂」的態度，也未語及幽居等詞；故曾壽是如何將這裡「山中僻處」的孤寂之境轉化爲後來「山中樂事」的隱逸之境的，又是一值得注意之問題。

實際上，曾壽「製造」幽居的詩，不止一例。對於〈學道〉一詩，曾壽即謂之「學道一首擬劍南體，聊以解憂」⁵⁸，這便又體現出以詩移心的反作用路徑。而其中「花時啼鳥非常樂，雨後晴窗分外明。半上簾鉤懸海色，四圍松籟湧濤聲」的造境，也與〈幽居〉一首頗爲相似。壬申七月初五（1932年8月6日）日記中的詩，更進一步體現出人爲之「在山中」與現實之「在局中」間的張力：

聞營口、海城一帶，陶賴昭、榆樹一帶，匪甚熾，日兵所到，匪去，而平民誣死者甚多，民怨益深，愈剿而匪愈多也。張海鵬兵與日兵衝突，斃日

⁵⁶ 張劍：「它（情境文學史）從多維度不斷逼近「真實文學史」，發現和釋放那些被禁錮、壓抑、遮蔽、遺忘的材料，使過去與當下的對話和互動更合情理、更有解釋力、更能回應新出現的問題，從而有效挑戰日趨僵化和模式化的「約定文學史」。」可參考張劍：〈稿本日記與情境文學史建構——以中國近現代稿本日記為例〉，頁72。

⁵⁷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54。

⁵⁸ 同前註，頁267。

兵四人，日兵報復，坑張部一百餘人。夜至納涼園小坐。

宵來平地變幽深，小几茶甌傍綠陰。水作溪聲喧近座，燈如星點出疏林。暫招初夜游人屐，已逗秋涼落木心。聊與邊城增故事，漫分絢爛與蕭森。⁵⁹

曾壽對日本人的行為常有批評，至其受挫則云「所謂多行無義必有斃者也」⁶⁰，至其得逞則云「以日兵殺吾民，何生可樂」。⁶¹ 但此處，他對張海鵬（1867-1951）與日人之內訌卻不著一語。張海鵬乃劫匪出身，曾為奉系舊部，後又主動投靠關東軍。若曾壽本就對他無好感，或許也不必置諸義憤。但僅看文本，緊鄰著坑殺一百人之血腥的，立刻便是納涼園的閒適，與「水作溪聲喧近座，燈如星點出疏林」的清靜幽美——「局中」與「山中」，這兩個空間因在文本中被並置而顯示出赤裸裸的割裂，效果近乎荒誕。此詩的幽謐之境，也因而被反襯出幾分不自然，近乎出於「製造」。

這類詩歌散落在曾壽的偽滿生涯中，幾已形成一條與國事書寫一體兩面的脈絡。因而，儘管它們的旨趣在於反映一種瀟灑的隱逸之樂，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逃避性」，但在更深層面上體現的卻是曾壽試圖以詩來安頓自我、消解「憂國病」的持續努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詩裡也熔鑄了曾壽的大量詩外功夫，正是它們使曾壽走向了「製造幽居」的自我開解方式。至於其中有哪些「詩外功夫」，不妨結合先前留下的問題來談：曾壽究竟如何將「山中僻處」轉化為「山中樂事」？本文試稍作推測。

首先，這或與曾壽習慣在不幸中發掘萬幸的性格有關。其妻病重時，他曾寫道：「今歲家人團聚，自是極難得之事，惟內子病暗，是為缺陷，當思不幸之中尚是極幸者耳。」⁶² 在作詠王昭君的詩時，他也曾說：「士之忠為主所知，

⁵⁹ 同前註，頁 158。

⁶⁰ 同前註，頁 133。

⁶¹ 同前註，頁 127。

⁶² 同前註，頁 322。

女有色而爲主所動，已至不易，則明妃之至不幸，猶有幸者存也。」⁶³ 兩處均是以積極的眼光來看待某種糟糕的處境，力求從中發掘一線生機。以是回看，則處於「山中僻處」既已不能避免，那麼趁機借詩模仿隱士，轉變看待自我的目光，也未嘗不是一種達觀。「山中樂事」，正是曾壽試圖改變其消極心態，在詩歌創作層面的結果。第二，曾壽爲一虔誠佛教徒，日誦《金剛經》、《普行願品》而數十年不輟。前述〈學道〉一詩，首句「學道原知萬事輕，無心寧復起心兵」即展現出他對佛教以無心爲道的深刻體認；而〈夜起〉一詩中的「往來思想任騰騰，已證禪天第一乘」⁶⁴ 兩句，亦是拋除雜念的相似姿態。故其「樂」原有更深的哲學根底，堪稱其生命追求的一部分；那麼試圖以「樂事」作爲「製造幽居」之詩的刻畫與呈現對象，便是其來有自的了。第三，政治主張的不見用確實催生了這時期陳曾壽的「逸民」而非「遺民」意識，他渴望遠離政治而過上一種隱士的生活。除上章關於李國松的一詩外，還有寄郭則沅的「妄冀荃察情，幸未橘化淮。何時遂幽討，與子投林厓」（〈嘯麓園中桐花正開久坐其下以詩寄懷因和〉）⁶⁵。故幽居不只是其「想象」，亦漸成一切實的「理想」。最後，這或許也和曾壽作爲一感性詩人對「境」的敏感有關。他曾認爲古時乃一禮教文明、日月和暢之境，所以人生極有味。反觀偽滿，則「豈若今之汲汲顧影，爲鬼爲蜮，無一毫之情味者乎。」⁶⁶ 可謂既寂寞又危險。那麼，以清新明快的花鳥松雲填充詩歌，視以愉目誦以悅耳，也未嘗不是在「製造」理想境界，以抵禦現實環境了。

上述推測若得不中不遠，那麼縱使曾壽的「幽居」是以詩歌「製造」而得，但其背後那一條試圖自我安頓的心靈脈絡，卻是實實在在、極具分量的；這類詩歌，則不妨看作這一脈絡的文字體現。但除「憂國病」外，前述「今之汲汲顧影」的孤獨也是他在偽滿中的一大難題。同鄭孝胥這位昔日老友의 隔闕自不待

⁶³ 同前註，頁 344。

⁶⁴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 178。

⁶⁵ 同前註，頁 178。

⁶⁶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 323。

言，原本相約為「白衣侍從」的胡嗣瑗，兩人也在胡氏接受執政府秘書長的職位後有所疏遠。關東軍參謀坂垣征四郎（1885-1948）因認為偽滿洲國不是清帝國，故原則上不歡迎遜清的宗室或遺老⁶⁷，曾壽居處越發門可羅雀。除偶來探望的陳氏兄弟外，大多時候便只是和同樣身處偽滿的徐思允（1933-1934）許寶衡（1875-1961）、傅岳棻（1878-1951）三位舊京同僚啣濡度日。故在徐思允也因事遷居後，他深覺痛心：「苕雪（徐思允字）之如夫人來，遂移居他所。夜譚之樂少一人矣！」⁶⁸曾壽性喜交友，與同人的交往是其自鼎革來一貫的重要寄託。不能忽略前述「何時遂幽討，與子投林厓」的隱居姿態中，便含有與朋友同行的隱秘期待。幽居之樂或許可以借詩「製造」，朋友卻終難憑空創生。周達曾在一首贈別曾壽的詩中寫過「丈夫啣濡賴知己，龍性豈受常人憐」（〈蒼虬南來弔漚尹侍郎之喪談北事甚憤作長句贈之以送別〉）⁶⁹，曾壽〈玉樓春·寄伯夔、君任〉一闕中的「冷瞰冰窗殘月伴」、「欲語無人惟月咽」⁷⁰，也是因無人在側而有的肺腑酸語。

或是緣此，曾壽常請假回津暫住。「弢老來」、「幼蘭來」、「嘯麓來」、「勉甫來」，類似的交遊記錄便會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陡增，展現出他與京津地區遺民故老的往來情形，也展現出朋友永遠是排解孤獨的良方。「飯後至桐君家久談，多及中興曾、胡諸公事跡，爲之神王。」⁷¹因與故人回想同治中興而心情振奮，這正是曾壽交遊之樂的一個縮影。而在此期間發生的阿育王寺唱和，就凸顯出該種交遊動態下曾壽「製造」幽居一類詩歌與在偽滿時的不同：「山中」這一原屬於曾壽自己的隱逸空間，得以透過唱和的形式與同人分享，成爲一連結、支撐、慰藉彼此生命的集體空間。試看其壬申年五月十四日（1932年6月17日）所記：⁷²

⁶⁷ 參考周君適：《偽滿宮廷雜憶》，頁125。

⁶⁸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52。

⁶⁹ 胡迎建主編：《同光體詩派著作集成（50）》，頁209。

⁷⁰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321-322。

⁷¹ 同前註，頁180。

⁷² 同前註，頁144-146。按日記中的曾壽詩有脫字現象，茲據其《蒼虬閣詩集》中版本補齊。

與嘯麓談鄧山阿育寺之勝，為之神往，有詩，因和一首

勞生念念餘塵土，笑口為君說鄧山。睡起隨參香殿上，飯餘無事古松間。
寒宵雪密茶初熟，精舍蘭開僧來還。無用苓參治幽瘴，深心迴向一開顏。

（曾壽）

殘生共墮修羅劫，幾世清修到鄧山。梵唄松聲喧寂外，心光佛影有無間。
世緣未了身猶寄，初地曾回意每還。何日打包隨掛錫，空中微莞解羶顏。

（治薌）

西來空說南山秀，見道何曾況見山。寺古僧棲松檜表，粥香鐘托夢魂間。
空中經似前身閱，物外情容一夢還。造誦清詩神欲往，入懷冰雪洗塵顏。

（立之）

前身君是淨名子，入世餘緣許佳山。佛火有情溫夜午，香林無恙出兵間。
經光靈閣三生托，詩夢清夜一夕還。龍樹追攀何日果，微吟先與發凋顏。

（嘯麓）

此次唱和起於曾壽為郭則沄講述昔遊鄧山阿育王寺之事，參與者除前已提到的郭則沄嘯麓和傅岳棻治薌外，還有周學淵（1878-1953）立之，他也是陳曾壽在天津的座中常客。儘管當時曾壽還未指出他「在山中」的處境，也未寫〈幽居〉一詩，一些頗具互文性的特征卻已出現。蓋四詩押上平十五刪韻，「山」恰為其首個韻字。詩人們雖是著眼名利，然名利頗有藏諸名山者（鄧山在今浙江寧波），故「在山中」之意，不請自來。透過題意，可知郭則沄此前並未到過阿育王寺，故其詩也具有想象的性質。「龍樹追攀何日果，微吟先與發凋顏」，即謂雖不知何時能前往禮佛，但可以先藉吟詩的形式一啓凋顏。於是，此詩也成了〈幽居〉一般的某種現實情境的替代品，先於外物對詩人產生了安慰作用。周學淵的「造誦清詩神欲往」，也強調了一種先藉寫詩來勾起對佛寺之希冀的心理現象。而無論是曾壽「睡起隨參香殿上，飯餘無事古松間」的僧侶生活，還是傅岳棻「梵唄松聲喧寂外，心光佛影有無間」的感官觸動，也都將阿育王寺的形象變得更具體可感，似乎已讓人「先驗」地看見了佛寺。

除此之外，「何日打包隨掛錫」、「入世餘緣許佳山」等詩句也表達了一種

諸人共有的遁世理想。若說要隱居為僧不免是具有「表演性」的題中之義，傅岳棻與蒼虬共事偽滿的經歷，卻也使其「殘生共墮修羅劫，幾世清修到鄮山」的悲鳴確有說服力。阿育王寺對曾壽的意義也不容小可。早先在寺中資福禳災的經歷使他印象深刻，已留下過諸如〈阿育王寺舍利殿〉、〈憶舍利殿〉等詩篇；而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為好友孫多嘯陟甫（？-1947）所作的花甲壽序中，他更以阿育王寺為「庶幾一生歸宿所在，得安身立命之地也」、「一旦得脫羈絆，即當肆志長往，約君續前遊，共證山門之樂。」⁷³ 將和友人一道在風景優美的佛寺裡享受遁世之樂，視為其終極理想。若詩歌真能「製造」幽居，那麼阿育王寺唱和其實也已成爲一種對「何時遂幽討，與子投林厓」的模擬——詩人們藉助詩歌在阿育王寺中隱居，卻是以酬唱的形式結伴前往。這，便不同於〈幽居〉一詩中的形單影隻。

依照雅斯貝爾斯的交往理論，自我的完善要靠交往來完成。但若沒有孤獨的自我，交往也會失去存在與發展的基礎與源泉。⁷⁴ 或許可以說：偽滿雖為曾壽帶去孤獨，但這孤獨也深化了曾壽與同人連結的訴求。透過阿育王寺唱和，他與舊京故老的响濡之誼與遁世理想便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和鞏固。於是，曾壽的「製造」幽居與同人唱和，也多少形成了與「憂國病」和孤獨之苦的對沖，使其偽滿生涯稍得寬慰。當然，日記中的部分記載仍會使人對詩歌之於曾壽的安慰效力稍加起疑。例如透過「肖旭約晚飯，坐有十四人。天熱異常，苛政也。」⁷⁵ 一則，即可看到「局中」的陰影對曾壽而言仍揮之不去。它甚至會以「天熱異常」這樣一種日常生活中未必罕見的氣候現象，使曾壽聯想起《尚書》中「曰豫：恆燠若」⁷⁶ 這樣的天人感應敘事，得出這是由偽滿之「苛政」引起的結論。曾壽為自己所築起的「山中」，有時竟抵不住一陣炎浪的侵入。但遺民們自我安頓的深度

⁷³ （清）陳曾壽：《孫陟甫六十壽序》，收於（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347。

⁷⁴ 可參考周宏：〈雅斯貝爾斯交往理論探析〉，《現代哲學》第1期（2000年），頁85。

⁷⁵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157。

⁷⁶ （西漢）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74。

還不止於此——在之後的「紀恩室」唱和中，曾壽或許找到了他靈魂真正的定海神針。

四、在室中：「紀恩室」唱和的「紀忠」底色

除前述名利一例，曾壽在偽滿期間（包括請假往來京津時）還有過許多唱酬。1932年重陽的香山之遊中，他與周學淵、傅岳棻、汪鸞翔（1871-1962）幾人便都有登高之作。⁷⁷ 有時無佳辰勝地，美麗的花卉也能觸動詩興：「託人在京購芍藥數枝，有正紅三朵極麗，惜為風日所爍，不久遂萎矣。」⁷⁸ 曾壽遂作〈瓶中芍藥有正紅者三枝艷麗無比〉，郭則沄、周學淵兩人起而和之。但總體來說，這些唱和都有一定隨意性，乘興而起，興盡則止。惟「紀恩室」唱和十分特殊：它由曾壽發起，囑託陳寶琛、黃孝紓（1900-1964）、郭則沄、傅岳棻、陳祖壬（1892-1966）、沈兆奎（1885-1955）、周學淵、周達共八人作詩，又請袁思亮作序、李國松作文、關松房（1901-1982）作畫，其本人亦賦詩二章並親作「紀恩室記」。如此正式的態度，顯示出的自然是它對曾壽的重大意義；然而參與者既夥，其中是否又蘊含著某種遺民故老的集體心理？惜乎日記資料之不獲使用，學界此前尚無對此的分析。故本章擬先對「紀恩室」唱和的經過稍作介紹，進而探討它在「紀恩」之下的「紀忠」底色及可能意義。

1931年末，溥儀首次秘密離津。此行雖未帶上曾壽，但他還是留下字條，命其隨後護送婉容前往旅順。曾壽風塵僕僕到達旅順行在後，溥儀為賃一小樓居之，其中已備好一切起居食息的生活用品。曾壽入謝，溥儀則說患難君臣如兄弟，不必客氣。曾壽遂感激涕下，謂「此千古臣子受恩近未有也」。⁷⁹ 1932年

⁷⁷ 曾壽詩題為《九日同季馥輩庵勉甫桐君及強志貽先弟約立之至香山作登高之會》，參（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180。

⁷⁸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36。

⁷⁹ （清）陳曾則：《蒼虬家兄傳》，收於（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350-354。

秋天回津後，他便於居所中專闢一室來存放先前的生活用具，並命之為「紀恩室」——此即其由來。

考諸日記，最早關於「紀恩室」的記錄則應屬壬申年九月二十日（1932年10月19日）中的「曾壽敬以上所賜木器及各用具陳於三層樓上一室」，⁸⁰此敘曾壽佈置紀恩室之始。之後則有10月30日中的「稚雲自京來，為繪〈紀恩室圖〉」，⁸¹稚雲即前述畫家關松房，此時曾壽已倩人作圖。11月2日所錄的曾壽詩一首和周學淵題紀恩室詩三首，⁸²則為其唱和之始。11月3日，曾壽賦詩二首，題為〈紀恩室詩二首同立之君任作〉，⁸³表明詩是三人商略而得。此後，日記中也開始出現曾壽同人在紀恩室裡夜話會飲的記錄。又11月19日，曾壽謂「嘯麓來，和〈紀恩室〉詩五古一首，甚工」，⁸⁴紀恩室唱和的範圍進一步擴大。11月25日，曾壽有〈次韻立之〉寫菊詩一首，首句「恩藏一室暖如春，世外幽花入座親」⁸⁵表明它於紀恩室中進行，句意則從陸遊〈午睡〉的「如何得一室，床敷暖如春」化出，亦見曾壽對此室之喜愛。12月4日，陳曾壽為袁思亮所作的〈紀恩室詩序〉賦詩一首，並附其序於日記中，歎為知音：「伯夔為予作〈紀恩室詩序〉一篇極佳，得立言之體。」⁸⁶12月14日，又有「梅泉來函，寄〈紀恩室詩〉五律二首，甚沉著」的記錄。至翌年1月21日，曾壽也使溥儀知曉了此事：「到局，見上。呈紀恩室照片及伯夔詩序，上甚嘉悅。」⁸⁷可謂君臣相歡。4月6日，曾壽請李國松為作〈紀恩室敘〉。最後，曾壽在4月7日親作〈紀恩室記〉一文，以當事人視角回顧事件始末，又具錄參與者姓名於記中，為該場唱和作了收束。

⁸⁰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81。

⁸¹ 同前註，頁183。

⁸² 參考前註，頁184。

⁸³ 參考前註，頁184。

⁸⁴ 同前註，頁186。

⁸⁵ 同前註，頁187。

⁸⁶ 同前註，頁191。

⁸⁷ 同前註，頁227。

以上，即紀恩室唱和體現在曾壽日記中的大致經過。部分參與者在日記中未被提及，如陳寶琛、黃孝紓和沈兆奎，這也說明唱和展開的實際情形會更複雜。但石任之認為曾壽佈置紀恩室的心理動因，是無法扭轉時局以報答君恩的不得志感，⁸⁸現在看來或許便不完全準確。一方面，若闢室用意在於抒發憂悶，似不宜將其照片和詩序呈之溥儀；另一方面，無力感雖貫穿了曾壽的偽滿生涯，但紀恩室的落成恰可能是他在此期間最大的精神慰藉之一。陳建銘論錢謙益的「一燈丈室」，嘗云：「……「一燈丈室」，本是人們最能掌握、最穩定的小小空間。陶淵明云：「審容膝之易安。」此中雖小，卻有佛力安頓、有愛侶隨侍於側，何況，室中有燈，尚遍照於日月所不能明處。」⁸⁹對曾壽又何嘗非是。只不過，佛力、愛侶，在此為帝力、君恩替代，試看曾壽〈紀恩室記〉中語：

夫當承平之時，天子優禮大臣，崇獎勳舊，於是有御書珍器之賜，受之者或登於堂，或陳藏於廟，歲時展仰，則入而拜焉，禮也。今茲倉皇播越，外無四方之貢，居無供頓之使，而以羈縻微臣行李匱乏，廩聖慮，捐內帑，為之備物，至纖至悉。俾臣之在外如歸於其家，骨之肉之，家人而子蓄之。⁹⁰

「在局中」是燕巢危幕，「在山中」是鷓鴣一枝。但在溥儀為曾壽佈置的紀恩室前身中，曾壽卻有了「家」的歸屬感。謂溥儀待其如「家人而子蓄之」，其實已為尊者諱，溥儀原話乃是「患難君臣猶兄弟」這一更平等的關係。君臣大倫，本不可逾，譬諸兄弟，這是溥儀自降身份。但正依賴「兄弟」所指向的家庭成員關係，「家」這一代表著溫暖親密的空間方得成立。正如曾壽所云，君臣在廟堂間

⁸⁸ 可參考石任之：〈冬郎情結豈香奩——論近代詩人陳曾壽的遺民心態〉，《文學與文化》第2期（2014年），頁138-139。

⁸⁹ 陳建銘：《錢謙益〈西湖雜感〉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頁97-98。

⁹⁰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247。

的賞賜與拜謝，乃是出乎「禮」，是天子示其富有天下，而臣子示其不逾名教；但天子在捉襟見肘的患難之際，仍以悉心照料，這體現出的便是超越「禮」的「情」了。繪事後素，言下之意，彌足珍貴。不過，此語溥儀可以說得，曾壽卻不能輕易受得，故「情」在落到其人臣自覺中時便再度成爲了「恩」。他隨之想起自己的本分，接著說：

吾豈敢侈焉以爲榮哉。吾日居於茲室，一俯仰之頃，一食飲之微，常凜然若相從於患難，而不忍以一日之佚，少忘在莒之艱。此吾所以爲茲室而質而名之之意。⁹¹

如勾踐臥薪嘗膽，如齊桓不忘在莒，此室除紀念溥儀恩情外，還意在提醒自己復辟之計未成。此刻，遺民的身份再度出現。詩史作者、隱逸僧人、交際名流……一切前述的其他身份，統統暫且告退。曾壽伴君側，入虎穴，屢在詩中以唐末隨侍昭宗之韓偓自許，在紀恩後當然便要思圖報恩。但報恩談何容易。且不論君子以不立危墻自潔，要扭轉時局，亦無隻手成事之理。故日記中，緊隨在「山中僻處」的無奈自述後的，便是「恩重無可爲報，滋益罪過耳」的自責。或是緣此，每當曾壽戴著韓冬郎的面具出現在詩中時，便不常有君臣相得之樂，反多眼淚和傷懷：「夷猶正則神靈接，際遇冬郎涕淚新。」（〈舟中〉）、⁹²「遠去孤臣傷麪豆，資行豪紀辱盤餐。」（〈重重大連寄愴仲〉）。⁹³此終是兩人之不同處。⁹⁴報恩不成，便成負恩；既成負恩，遺民之爲遺民的價值便值得懷疑甚至否定——這或許才是曾壽入偽滿以來的最大心結。「若不能爲絲毫之補救，尸位素餐，徒招指摘，臣不忍爲也」、⁹⁵「予非懼衰也，恐生時爲餘氣之尸居，死後爲

⁹¹ 同前註，頁 247。

⁹²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 171。

⁹³ 同前註，頁 172。

⁹⁴ 石任之對曾壽在「紀恩」與「負恩」間的掙扎心態與他和韓偓的不同已有精要分析，可參考石任之：〈冬郎情結豈香奩——論近代詩人陳曾壽的遺民心態〉，頁 137-140。

⁹⁵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第 738 頁。

倘恍之游魂耳」，⁹⁶曾壽早年便有澄清之志，鼎革後亦尚抱預世之心，故使其尸居餘氣，不異鈍刀割肉。忠厚者總選擇不點破情實，曾壽惟將一切屬於和不屬於他的責任都抗在肩上而已；但日居月諸，他或許也需要釋放和肯定。而對舊式文人而言，或許只有在詩文唱和中，那不被言說的才能被言說，那不便自道的才能被知己道出。遺民的存在意義，遂從四面八方的詩文中重新攢聚，匯於紀恩一室。試看袁思亮〈紀恩室詩序〉中語：

當此之時，乃有人焉，名聲無所收，權利無所取，違室家，忘飢寒，冒險難，間關宵出，追隨故主於冰雪輪蹄間，相啣濡若骨肉，此亦足以綿正氣於垂絕，維人紀於不敝矣。匹夫遊俠慕義，猶足以摩世厲俗，況乎憂危患難之際，君恩臣節相得章章如是，而有不撼心動魄、怦然興敬愛之懷者，豈人之情哉！⁹⁷

與曾壽的記不同，此序的論述重心發生顯著偏移，由對溥儀的「紀恩」轉向了對曾壽的「紀忠」。袁思亮將曾壽描繪為一不求榮利、不畏艱辛的遺民典範，並認為其事跡有「綿正氣」、「維人紀」於道德凋敝之世的實際作用。而對曾壽來說，這或許是他自入偽滿以來得到的一個前所未有的肯定。一方面，他的存在不再是「餘氣尸居」；另一方面，袁思亮的褒獎或許也正中其下懷。今人看來，綱常似乎不如政務質實，但它卻同樣為曾壽看重。早年他便為江陵烈女張菑衡寫過紀念詩，謂其「人生孰無死，一死扶三綱。天地將欲閉，見此麟鳳祥」⁹⁸（〈江陵戴烈婦詩〉），極陳其品格之於亂世的意義。而時過境遷，當曾壽亦被目為扶持綱紀之人時，焉能不百感交集。張子璇認為，由於民國無君，清遺民實質上是在「為一不存在絕對政治與道德責任的「國故」或「道統」守節，卻更能體現

⁹⁶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288。

⁹⁷ （清）袁思亮：〈紀恩室詩序〉，收於（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192。

⁹⁸ （清）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54。

出清遺民在情感上的忠純」。⁹⁹若不仕新朝已足表操守，那麼在患難中仍捨身相隨，其用心當然更見精純。

這種「紀恩」與「紀忠」的側重差異，在曾壽與他人的詩間也存在著。曾壽〈紀恩室詩二首同立之君任作〉中的詩句，其實不少是從周學淵的〈題紀恩室詩〉三首化出，但取捨間便見用心不同。如周氏「特賜千秋少，高陳一室尊」強調曾壽所得恩沃之罕有，其意便在推崇曾壽。但它至曾壽詩則變成了「自驚殊賚溢，頓覺小樓尊」的誠惶誠恐，語意相仿，著眼點已大不類似。周氏的「傷心趨走地，沒齒海天恩」到曾壽詩中也變為了「傷心趨走地，沒齒解推恩」，這或許是因解衣推食的典故天然更貼近溥儀為置生活用品的場景，也就更能凸顯溥儀形象。至於「羈旅資生具，纖微聖慮煩」這樣專就溥儀而作的刻畫，也只是曾壽詩的獨創。

但在陳寶琛的〈題仁先紀恩室〉¹⁰⁰中，「紀忠」的傾向便十分顯著。頷聯「太官供具方茲褊，大第酬勳孰與隆」，上句謂宮中之膳食器具亦不如溥儀賜物，下句謂甲第高門所得恩賞猶不如曾壽，這尚是為君臣各賦一句。但頸聯「陸九解衣驚受寵，冬郎留燭愴懷忠」則是將曾壽比作陸贄、韓偓，全從他的角度著手描畫了。「懷忠」一詞，亦間接表達了曾壽的「忠」之品格。郭則沄〈仁先屬題紀恩室且為述從亡舊事感歎賦之〉¹⁰¹為一敘事性五古長詩，但也主要從曾壽的角度著眼：「君臣若家人，昔聞其語耳。殊遇古亦難，今者一陳子」、「於茲關斗室，感歎聊自紀。所嗟圖報艱，言終淚如泚。白衣謁靈武，公乎心社墮。異數出至誠，九天鑒在邇」對曾壽的殊遇和心繫清社之狀皆作了強調與刻畫。周達〈用恩字韻和蒼虬紀恩室詩〉¹⁰²兩首同理，「瑣尾孤臣淚，纏綿故主恩」、「杜老麻糍破，韓侯敝袴溫」、「報國心肝在，微生蟻蝨存」或用舊典，或以直筆，

⁹⁹ 張子璇：〈為誰粉碎到虛空：1924年「雷峰塔圮」事件的詩詞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79期（2022年），頁191。

¹⁰⁰ （清）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41。

¹⁰¹ （清）郭則沄：《龍顧山房詩續集》第四卷（民國棚樓刊本，1928年），頁11。

¹⁰² 胡迎建主編：《同光體詩派著作集成（50）》，頁225。

念茲在茲，都是作為人臣的曾壽。

儘管曾壽本人的詩皆卑以自牧，並不突顯自己的扈從之忠，但就今日尚且可見的他人和作而言，卻多以描繪與肯定其遺民品格為主旨，這或許也是同人間基於交誼的默契。以是，「紀恩室」唱和因更廣泛的遺老群體的參與，其實漸漸被賦予了「紀忠」的底色。在此過程中，偽滿局中人這一有污點的遺民形象，透過詩歌而得到澄清、詮釋，乃至重塑；曾壽在偽滿中的存在危機，也終於得到正面回應甚至升華。這不同於國事書寫的旁敲側擊，亦非「製造」幽居的高蹈遠引和阿育王寺唱的友朋之樂；它毋寧說是部分尚存的舊京故老，在人品綱紀等終極問題上，給予其的一次有溫度的體諒與肯定。而多年以後，曾壽本人似乎也接受了紀恩室所蘊含的「紀忠性」。在與鄭孝胥恢復交往後，他曾作〈寄海藏舊京〉¹⁰³一詩，語涉出處問題。「獨望西山誰共語，晚來東道賸招魂」，便是暗示許多清廷官僚於鼎革後擇木而棲，舊京西山已無人共語。但說到自己，曾壽則謂「地動天迴愁偏處，身謀寧徇一樓尊」，用紀恩室指代一種關於遺民操守的立身準則，以示矢志不移。至此，「恩」與「忠」在曾壽處亦融為一體。

最後，某種屬於舊京故老的集體心態，亦未嘗不在此過程中被昭明、抒發。試看袁思亮詩序中的結尾部分：

朔風沓寥，隅海一樓，孤臣遺黎，誦旄邱之詩，相與發為謳吟，有不知泣下沾襟者，果何世耶！¹⁰⁴

當唱和者的身份同為「孤臣遺黎」時，他們圍繞紀恩室展開的謳吟，便有了借曾壽酒杯自澆塊壘的意味。「旄邱之詩」，毛詩以為抒發的是流亡衛國者對衛國君臣見死不救的譴責之情。此處隸事，矛頭自然指向偽滿的日人。於是，為之「泣下沾襟」的遺民們也一定程度地展現了他們的反偽滿立場，紀恩室唱和因

¹⁰³ (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頁 217。

¹⁰⁴ (清) 袁思亮：〈紀恩室詩序〉，收於(清)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第 192 頁。

此成爲了反對派遣民寄託相似的身份認同、倫理觀念和政治態度的集體詩歌活動。他們作詩、作文、作序，將曾壽的事跡留存、播越，除了展現末世遺民的悲愁無奈外，其實還傳達了某種共同的士人擔當，即其持節不改所形成的維繫綱紀的道德意義。紀恩室這一小樓隨之而具備了幾分巫鴻所說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它和「回憶、延續以及政治、種族或宗教義務有關」。¹⁰⁵可以說，透過曾壽及其同人的題詠賦義，紀恩室就成了這樣一座屬於清遺民的「紀念碑」。

五、結語

陳曾壽作爲一偽滿時期遺民群體中的關鍵人物，研究他及相關同人在此期間的詩文唱和，或許具有節點性的意義。本文試圖展示偽滿初期時舊詩在他們的孤吟和群詠間出現的新動態，並以圍繞「局」、「山」、「室」這三個空間展開的詩歌書寫爲主要關注對象。這既意在反思既有的偽滿文學史敘事，也試圖爲鼎革以來的遺民詩脈絡刻上一個新的小坐標。而考諸《陳曾壽日記》及類似的遺民資料，或許也還有大量可從「情境文學史」角度入手的詩歌材料等待著處理、論述。

但除上述的學術意義外，本文之關乎古典詩歌終極價值者，卻又何在？「孤光已澈三生影，寸鐵猶挾百戰身」（〈小劫一首〉），¹⁰⁶上句謂已借佛教慧光參悟人生虛幻，下句則借盧仝〈月蝕詩〉中的「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蟆癡腸」，來抒發仍要與奸邪鬥爭之志。在偽滿寫的這首詩中，曾壽似乎打破了他借由逃禪而得的平和心境，又著相了。但所謂「孤光已澈」，就說明他是甘願著相。或是緣此，詩在他手中才出現了如此多的面向和作用：記錄國事機密、調整自我心境、連結友朋打消孤獨、給予彼此體諒和肯定、播越傳統倫理觀念……詩歌，在

¹⁰⁵ 巫鴻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5。

¹⁰⁶ （清）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頁266。

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著相」。但也正是藉此，我們才能看到，在古典漸已遠去的 1930 年代中，在處眾人之所惡的偽滿裡，舊詩仍在發揮著安身立命的重大作用。而這一小小的歷史片段，是否能給後人些古典常新的啟發和希望呢？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西漢) 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 (南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 (清) 袁思亮：〈紀恩室詩序〉，收於(清)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 年），頁 192-193。
- (清) 郭則沄：《龍顧山房詩續集》後加第四卷（民國栩樓刊本，1928 年）。
- (清) 郭則沄著，馬忠文、張求會整理：《郭則沄自訂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
- (清) 陳祖壬：《蘄水陳公墓誌銘》，收於(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349-350。
- (清) 陳曾則：《蒼虬家兄傳》，收於(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350-354。
- (清) 陳曾矩：《蒼虬閣詩集跋》，收於(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394-395。
- (清) 陳曾矩、陳曾壽：《局外局中人記》，收於(清)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 年），頁 716-753。
- (清) 陳曾壽：《讀廣雅堂詩隨筆》，收於(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330-344。
- (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
- (清) 陳曾壽：《孫陟甫六十壽序》，收於(清)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 年），頁 346-347。

(清)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

(清) 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朱剛：《蘇軾十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

吳盛青、高嘉謙：《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

巫鴻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汪辟疆著，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周君適：《偽滿宮廷雜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胡迎建主編：《同光體詩派著作集成(50)》(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

張之淦：《蒼虬閣詩集》張之淦批語，收於(清)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436-448。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9年)。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及其歷史脈絡》(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21年)。

(二) 期刊論文

石任之：〈冬郎情結豈香奩——論近代詩人陳曾壽的遺民心態〉，《文學與文化》第2期(2014年)，頁136-140。

周宏：〈雅斯貝爾斯交往理論探析〉，《現代哲學》第1期(2000年)，頁85-91。

徐雁平：〈「文獻集群」與近代文學研究的新拓展〉，《文學遺產》第3期

(2022 年)，頁 173-177。

張子璇：〈爲誰粉碎到虛空：1924 年「雷峰塔圮」事件的詩詞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 79 期（2022 年 12 月），頁 173-228。

張劍：〈稿本日記與情境文學史建構——以中國近現代稿本日記爲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 3 期（2023 年），頁 71-82。

劉曉麗：〈殖民統治與國民意識的建構——對偽滿洲國的文學活動的一種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2 期（2010 年），頁 110-116。

（三）學位論文

李宇潔：《郭則沄詩歌研究》（江西：華東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23 年）。

陳建銘：《錢謙益〈西湖雜感〉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曾慶雨：《陳曾壽詩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 10 月）。

**Within the Bureaucracy, Within the
Mountains, Within the Study:
National Affairs and Self-Accommodation
in Chen Zeng-shou's Early Manchukuo-Era
Classical Poetry**

Yin, Nuo

PhD Candidat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An examination of Chen Zeng-shou's diaries, poetry and poetic exchanges with Manchu loyalists in the Beijing-Tianjin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Manchukuo reveals that the harsh environment stimulated his writing and that of some of his contemporaries. The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poetry, in their hands, not only remained undiminished but even increased, serving the dual purpose of witnessing state secrets and providing solace for their personal lives. While his position as an "insider" initially caused Chen Zeng-shou considerable anxiety,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Han Kui and Chen Yuan-yi, this position was transformed in his poetry into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recording the situation in Manchukuo, with poetry becoming an act of resistance against reality. Yet, the depravity and loneliness of Manchukuo remained a source of suffering. Chen began consciously using poetry to "create" seclusion, transforming his isolated existence in "a secluded mountain retreat" into the idyllic setting of "mountain pleasures." The poetic exchanges at the A-yu-wang Temple during his return to Tianjin further utilized the unique form of classical poetic

exchange to embody and solidify the bonds of friendship and the ideal of seclusion among Chen and his peers.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Ji En Shi” (Memorial Hall of Gratitude)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depth to which these loyalists used poetry to find solace: originally intended to commemorate Pu Yi’s benevolence, the meaning of the “Ji En Shi” gradually shifted in the poems of its contributors from “gratitude” to “loyalty,” becoming a spiritual monument affirming the character of these loyalists.

Keywords: Chen Zeng-shou, Qing loyalists, Manchukuo, classical poetry

